



火,既是人类文明的肇始之光,也是一柄利弊相生的双刃剑。自远古先民钻木取火,人类便与火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由此而生的火神信仰,绵延数千年,成为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火神为谁?古籍记载中有多种说法。《神诞谱》称火德星君,为炎帝神农氏之灵;《史记》则载火神为祝融,乃颛顼之子;《国语》又将火神称为“回禄”,后世称火灾为“回禄之灾”,即源于此。民间百姓则没有那么多讲究,统统尊称为“火神爷”,而祭祀火神的庙宇,便称为“火神庙”。

天津自明初建城,至清代初年,尚为军事卫所,人口相对稀少,对火神的祭祀也未受到特别重视。康熙年间刊印的《天津卫志》中,记载的火神庙仅有一座,位于西门外西北隅的教场。雍正三年(1725),天津由卫所改为天津州;雍正九年(1731)雍正帝又批准直隶总督唐执玉的奏请,升天津州为天津府。从此,天津正式从一个军事据点,转型为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。

随着漕运、盐业和商业的日益发达,天津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商品集散地和商贸中心。作为北方水陆重镇,天津城内商铺林立、民居稠密,街巷屋宇鳞次栉比,极易引发火灾。当时虽有专门负责救火的民间组织“水会”,但受限于落后的救火设备,面对火势往往力不从心。百姓出于对火灾隐患的恐惧,祭祀火神、修建火神庙之风遂日益兴盛。因此,乾隆四年

天津旧时的火神庙

赵耀双

(1739)刊印的《天津县志》中,记载天津城厢的火神庙已达六座。而至同光年间,随着天津城市的进一步发展,火神庙数量已增至十余座。

明清两代均将火神庙祭祀列为国家祀典,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,从皇家到各省府县,均要举行祭祀仪式。天津官府致祭的火神庙,位于城内板桥胡同。其他民间所建的火神庙,则基本都坐落于人烟稠密的区域。据《津门纪略》记载,清末天津城厢附近共有六座火神庙:“一在鼓楼西板桥胡同;一在北门外;一在西门外;一在河北;一在盐坨;一在闸口。”

天津开埠后,随着租界的出现和城市的变迁,许多火神庙逐渐消失或改作他用。位于盐坨南、靠近季家楼的火神庙,其址附近于1892年建成了老龙头火车站,即今之天津站;盐坨北、靠近东浮桥(今金汤桥)的火神庙,庚子后被划入奥租界;城外闸口宝林庵南的火神庙,被划入了日租界。

北门外的火神庙,民国后改为派出所,其位置在当时北门外繁华的针市街、肉市口大街附近,是当地著名的地标。1923年5月6日《大公报》登载“南开集合地出发之路线”一文即有“西南城角、西马路、西关大街、横街子、铃铛阁街、太平街、针市街、火神庙转茶店口……”的记载。

受清末民初“废庙兴学”风潮影响,许多庙宇改为学堂,火神庙也不例外。坐落在赵家场抬埋会大街附近的

火神庙,在2003年城市改造中,红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于此征集到“贫民学社碑”一通,碑文记载“赵家场第三第四贫民学社,系火神庙旧址也”,可见此庙在民国初年已改建为贫民学社。城内板桥胡同那座官府致祭的火神庙,改建成了天津私立普育女学校,这是天津最早的民立女学。该校由天津近代教育家温世霖于1905年创办,校址最初在老城二道街荣家胡同,学生仅有五六人,1906年春迁至鼓楼东沈宅东院,学校初具规模,学生增至50人。“是年夏,以来学者踊跃,复迁校址于板桥胡同火神庙内。”(《天津志略》)

西门外的火神庙,即建于教场的天津最早的火神庙,俗称“黑火神庙”。火神庙旁的教场原址,于1904年建成“天津罪犯习艺所”,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座新式监狱。本世纪初监狱外迁后,这里改建成了治病救人的天津市人民医院。此外,光绪年间编修的《重修天津府志》中,还记载有一座火神庙位于“河东锦衣卫桥”。此处“河东”非指今日之河东区,而是当年金钟河以东。锦衣卫桥跨金钟河上,是天津历史上的名桥。其地附近人烟稠密,建有一座火神庙顺理成章。后来随着海河裁弯取直,金钟河逐渐淤塞废弃,最终于1953年被填平。这里的火神庙早已不存,却留下了火神庙前胡同和火神庙后胡同两个地标性的地名。上世纪90年代城市改造中,胡同消失,如今这里是河北区金波里和金蕾花园的交界之处。

天津老城厢火神庙的兴废变迁,见证了天津从卫所、府城到现代都市,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,成为天津城市文化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该街角位于现万全道与河南路交叉口。主体建筑为三层平顶,缸砖清水墙。原为日租界伏见街与春日街交口的大福楼旧址。照片摄于2012年11月

老街角掠影

张建文并摄



以蒸饽饽充饥度日。大堤上成排成行的槐树,品种也由原来的坐地槐改为洋槐。但大舅妈不一样,她执着地认为,天生一物必是老天爷的赏赐,她会在槐树开花时,去采摘些含苞待放的槐花用以制作吃食,不再是为填饱肚子,而是吃个新鲜和稀罕,享受老天爷的馈赠。

大舅妈采摘槐花时小心翼翼的,轻捋轻摘生怕弄坏了槐花。大舅妈见解独到,说,过去槐花被当成充饥的“野菜”,可以揉搓,现在是稀罕物,采摘时应尽量保持花形,才能锁住清新的花香。

槐花采摘下来后,大舅妈先用水轻轻冲洗,洗后沥干水分,使其干爽。棒子面与白面按照七比三混合,撒少量盐后放入槐花搅拌均匀,让每朵花都裹上面粉,接着放在清洁的屉布上,放入蒸锅,中火蒸十来分钟,保证面粉成熟即可。不等揭锅,槐花的清鲜味儿便扑鼻而来。

大舅妈还自制了一个蘸料儿——辣椒油、蒜泥、少量的盐,大舅妈号召孩子大人先不蘸料儿,先吃上几口槐花,可以充分吃出槐花原味儿来,但那时孩子们普遍体会不到花的本香,蘸料吃才能吃出花的鲜香和微甘。

柳墅行宫沧桑录

御赐墨宝承载历史记忆

曲振明

柳墅行宫贮存着大量乾隆御赐墨宝,承载清代皇家文化与历史记忆。这些墨宝涵盖纪事语、匾额、楹联、御制诗四大类,或由乾隆皇帝亲书,或由重臣代笔,笔力遒劲,意蕴深远,为这座行宫增添了浓郁的文化底蕴,见证着柳墅行宫的鼎盛与沧桑。

在柳墅行宫贮存的墨宝中,两篇重要的纪事语尤为引人注目——《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》与《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》。这两篇纪事语均由乾隆皇帝亲撰,是所述事件的官方定论与治台纲领:既复盘战事、标榜武功,也明确推动治台政策转型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两篇珍贵的纪事语并非乾隆亲自书写,而是由大臣董诰奉命誊写,字迹工整,笔势沉稳。

董诰(1740—1818),字雅伦,又字西京,号蔗林,浙江富阳人,是清代著名画家董邦达的长子,父子二人在画界并称“大小董”,名噪一时。乾隆二十九年(1764)考中进士,自此步入仕途,一生历经乾隆、嘉庆两朝,深得信任与器重。乾隆四十四年(1779),董诰入职军机大臣,旋即兼任户部尚书,不仅政绩卓著,更以书法、绘画造诣深厚闻名,也因此成为誊写御制纪事语的不二人选,为柳墅行宫留下了珍贵的墨宝遗存。

除了纪事语,柳墅行宫还珍藏着多块乾隆御书匾额。如行宫牌楼东西两面,分别镌刻着乾隆亲书的“柳墅”与“瀛津”四字,“柳墅”二字点出了行宫遍植垂柳的特色,清雅灵动;“瀛津”则彰显了行宫地处海河之畔、濒临瀛海的地理优势,大气磅礴。此外,行宫内部各殿阁也均有乾隆御赐匾额。

楹联作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点睛之笔,在柳墅行宫中也随处可见,且多为乾隆亲书。除了“偕乐堂”“播醇斋”“海棠厅”“校签室”的楹联外,行宫奉佛处有一幅内殿楹联,庄严肃穆,契合奉佛祈福的氛围;顺山房、歇山楼下各有一幅,内殿另有两幅,每一幅楹联都精心构思,为行宫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。

御制诗是柳墅行宫贮存的墨宝中数量最多、最为丰富的一类,见证了乾隆皇帝多次驻蹕行宫的心境与足迹。自乾隆三十二年(1767)至乾隆五十九年(1794),近三十年间,乾隆每次驻蹕柳墅行宫,都触景生情、挥毫题诗,累计留下数十幅御制诗墨宝。这些墨宝分别用洒金红绢本、洒金黄绢本、洒金米色绢本、黄绢本、紫绢本、古铜色绢本、藕色绢本、洒金红蜡笺本、洒金米色蜡笺本、钩金粉红蜡笺本、钩金藕色蜡笺本、钩金黄色蜡笺本、钩金米色蜡笺本、钩金碧色蜡笺本、钩金豆青蜡笺本、钩金粉青蜡笺本、洒金碧笺本、洒金红纸本、洒金浅红纸本、洒金粉红纸本、宣纸本书写,皆由宫中工匠装裱成横幅、直幅和方幅。

这些御赐墨宝,是乾隆书法艺术与文学素养的集中展现,也是柳墅行宫历史地位的最好佐证。

鸡毛蒜皮

由国庆

生活中有一些人喜欢计较,不愿意吃一点亏,其实细说起来,那些事可能多数是“厨房里的垃圾——鸡毛蒜皮”。这句俏皮话也在讽刺个别人花费时间和精力用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,而忽视了更重要的事情。

说起来,人与人相处,不可能事事都计算得清清楚楚,假如一个人总想自己成为那个占便宜的角色,那久而久之会发现,自己不仅不会因小便宜而受益,反而可能会过得越来越糟。很多时候,付出越多的人,往往得到的会越多。



●老口福

蒸槐花

杨世珊

每到四五月份,村里的槐树不见树叶,满是白花,很远的地方就能被槐花香得晕乎乎的,沁人心脾,令人神清气爽。节粮度荒时,人们争相将槐花采下,掺上棒子面、麸子等,蒸成槐花饽饽,用以充饥度日。

过了那段岁月,人们便不再在意槐花的花开花落,也无人争抢槐花用